

上有魅力的语文课

散文，一般是写真实的事、真实的人、真实的情，它的特点就在于随意，任意挥洒，明心见性。正因为如此，散文往往能把作者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，阅读散文，教学散文，就是要读出、教出它的“真”。通过文字，读出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以及不想告诉我们的真实的东西。

做有主张的语文教师

教学篇

上课的学问

语文教学优质资源的获取和运用

黄玉峰◎著

文言文教学，千百年来前人已经总结了十分丰富的经验，我们不能无视传统，另搞一套，美其名曰“创新”。现在教文言文的最大误区就是自以为是的分析。不读不背，一味分析，“碎尸万段”，支离破碎。文言的词汇需要积累，文言的句法需要积累，文言的习惯需要积累，积累多了，读文言就成了自然的习惯。

教学首先是一门技术，而不是艺术。艺术追求的是享受与陶醉，追求的是形式与审美，这都不是教学本来的内涵。教学要实在，要实效，要落实，这都属于技术范畴。只有当技术日臻完善，教学才可能像艺术一样，既实用，又有欣赏价值，达到完善与完美的统一。

好的阅读教学当具备三个条件。其一，教师自身能够文本之真味；其二，不必面面俱到，只需拎出关键；其三，适应学生水平，实录中学生的风采丝毫不逊于教师，师生之间，对话精妙，相得益彰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课的学问：语文教学优质资源的获取和运用·教学篇 / 黄玉峰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6. 1

ISBN 978-7-5537-5211-2

I. ①上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语文课—课堂教学—教学研究—中小学 IV. ①G633.3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0256 号

上课的学问——语文教学优质资源的获取和运用 (教学篇)

著 者 黄玉峰
责任编辑 傅 昕
责任校对 郝慧华
责任监制 曹叶平 周雅婷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座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pspress.cn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87 000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37-5211-2
定 价 36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。

序一

师魂：尊德性而道问学

一位独行侠，在喧嚣、荒芜与溃败中，默默撑起语文界的脊梁。他是名师中的名师，是有名士风度、卓尔不群的真名师。他叫黄玉峰。

这些年我几乎走遍全国，对语文教师有较广泛的了解。小语界群星荟萃，名师大腕广为人知。中语界忙于应试，相对而言，较沉寂、封闭，虽也有中生代名师抢眼，但知名度远不及小语名师。我以为，持平而论，不分小语、中语，要论语文界“天王级”巨擘，非玉峰先生莫属。

读玉峰先生的书稿是师魂的熬逼与荡涤。他的课，是培育“立言者”的课，是有德性魅力与思想张力的课，是有言语生命意识与言语信念、信仰的课。这样的课，可使学者、教师得以自我反思、拷问与升华。我真诚祈盼所有的语文学者、教师，语文专业的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，都能读读这本书。不读黄玉峰，就不知道什么是有境界、襟怀的语文课，什么是当今最好的语文课。

我不敢说他的课完美无瑕、已臻化境，但可以断言，这是有境界、襟怀的课。王国维说：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”“东坡之词旷，稼轩之词豪。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，犹东施之效捧心也。”^①他说的是词家，对教师亦如是。玉峰先生之课，其境界、胸襟是学不到的，只能景仰、追随——能一瞻丰采，树精神之高标，足矣。

① 王国维：《人间词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1页、第11页。

其境界、胸襟不可学，其修养、修为、修持之精神、路径、方法可学。课如其人，读其课，知其人。我以为，玉峰先生的境界、胸襟之精神内核，用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以概之，最为恰当。只要读了他的书，与他有所交往，定会感受到他本真、良善、敦厚之德性，深厚、精微、中庸之学问。他称得上仁义、通达之人。

认识玉峰先生十余载，只见过两次面。然而其德性、学问常萦我心。

十多年前，玉峰先生以“语文教学‘叛徒’”的形象，走进我的视线。第一次见他，是在1999年“中语会”天津年会上，我亲睹了“抢话筒”事件。此事颇为轰动，让我真切感受到他“金刚怒目”的一面。是时，语文教育病入膏肓，人神共愤，学界口诛笔伐其弊害，然而，会上还在歌功颂德、文过饰非，且容不下不同的声音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未来，为了捍卫话语权，他绝不苟且，冲上讲台，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。那年他54岁，李镇西先生善意地谑称其“‘五四’青年”，颇得其神韵。在小是小非上，他则克己谦和、善解人意。他出版《教学生活得像个“人”》时，编辑要删掉观点较尖锐的两章，他宁可不出版也不愿删改，可是当教育界前辈吕型伟先生出面关说后，他妥协了：“九十四岁的老人和你说这个话，我要是一定说到外面去出，我不出了，那老人心酸吧，人该圆的地方也要圆，要有人情味。”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温厚纯良的他。是非分明、刚柔相济的品格，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鲜明，二者水乳交融。在本书中，我们会读到许多他对名人名篇犀利、深刻的批评，而他渗溢其中的宽广、仁爱、体恤之心，也无所不在地温暖、感动着我们。

他是性情中人，重情重义之人，这从日常点滴交往中也能感受到。在待人处事、生活细节上，他是无微不至、温暖体贴的长者。他是书法家，不卖字，却不吝惜送字。2014年底，我到复旦附中讲学，恰巧见到他课外指导学生学书法，他给在场所有学生写羊年贺岁对联，不厌其烦，

一字不苟。有时自己觉得写得不够好又重写，直到学生都拿到喜爱的对联才罢手。那天晚上，他与“基地”“工作室”的老师们聚会，送给几十位老师每人一幅字，我想，不知他为此费了多少时间与心血。我与他并无深交，然而多年来我都会如期收到他的贺岁书法作品。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外出讲课，也不忘送学生“墨宝”留念。“仁者爱人”，相信凡与他接触过的人，都会感受到他的殷切情谊。

他对自身的德性修持令人敬佩。诚以待人，严于律己。对“名利”的自律，几乎到苛刻的地步。当今之世，最难做到的便是“无诱于势利”，这是德性的底线，而他坚守住了。“教而优则仕”“学者从政、当官”，是当今的时尚，是教育界的潜规则。以他的才华与名望，本可以心安理得地获取许多“正当”回报，可据我所知，他当过最大的“官”是语文教研组长，他一辈子就是个普通教师。在世人眼中，这似乎与他的声誉极不相称，然而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当一个纯粹的教师，纯粹的语文教师——像玉峰先生一样，心无旁骛、春风化雨，比什么都好。

声名远播却“无诱于势利”，这便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、胸襟。他不但“教而优不仕”，连叫他去做课本主编他竟也不去。这绝对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，以他的学识与声望，当之无愧，何况这也不算什么“官”。但他是这么看的：“教科书主编的权力是很大很大的。我为什么推掉？编教科书这个东西你肯定是要跟别人走的，如果我自己的东西做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，还不如不做。”他不愿意为了名利而丧失道义。在今天大约没有多少教师、学者能抗拒这样的诱惑。扪心自问，我也不能。以他为镜，自惭形秽。

不论他是白黑分明，惊世骇俗，还是委曲求全，温情脉脉，或是不失初心，坚执道义，其本色是一介谦谦君子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荀子曰：“德操然后能定，能定然后能应，能定能应，夫是之谓成人。”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“志

意修则骄富贵，道义重则轻王公；内省而外物轻矣。”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说的不就是玉峰先生？

所有这些美好，都可归之于“尊德性”。“德性”源于人之善本性，又高于善本性。德性在善心、善良之上，即“至善”，须后天长期修养、修炼而成。“尊德性”，用康德的话说，是追求“崇高”。“崇高”来自“优美”，却胜于“优美”。“优美”是天生的，也是浮浅、粗糙的；“崇高”是在“优美”之上的修养、修为，是深刻、精致、丰富的。只有经过对自然人性中美好品质的不懈打磨、涵养，才能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才能“处心有道，行己有方”^①。

德性不同于“道德品质”，其内涵更宏观、立体、深厚，是人整体的精神气质，综合的人格魅力。诚如玉峰先生所言：“人自己的个人修养最重要，个人人格最重要。什么都可以输，但我不输人格。”德性，是人格修养的极境。看不见摸不着，但由内而外地流光溢彩。即所谓：“情深而文明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。”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——在玉峰先生身上，便流溢着德性的温煦。从他的言谈举止中，能感应到“温柔敦厚而不愚”的气场。

“德性”修炼，须建立在“学问”基础上，玉峰先生是深知二者相得益彰的关系的。有此二者才担得起教师“教书育人”之重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将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并举是很有道理的。因为，“德”与“学”是成就“君子”的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。孔子便极看重“德”与“学”的交融，整部《论语》，既是教人“做人”之德，也是教人“为学”之道的。如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这些，说的既是“德”也是“学”，“德”与“学”相互交融，

^① 韩愈：《答李翱书》，见童第德选注：《韩愈文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28页。

难解难分。孔子的“修德”便是基于“学问”的，所以，他关于“为学”的论述不胜枚举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也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他之所以重“学”，是因为“德”需要“学”来支撑，从“学”中养、“学”中悟。“学”是“德”的源泉，“德”是“学”的目的。对此，宋代理学家程颢说得很清楚：“学本是修德。”“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，其他则不学。”（《二程语录》卷十一）这虽然说得有点极端，“学”自然不单为了“修德”“养情性”；但从“德性”“情性”要靠“学问”滋养来说，是对的：“修德”须“明理”，“明理”须“学问”。“学”是“德”“理”的支点，“德”“理”是“学”的终极目的。修德性、明道理是建立在求学问之上的；反过来，学问也需要德性、道理的指引。在儒家学者看来，这些是相辅相成的。

作为教师，育人，需要“尊德性”，“修德”“明理”须“学问”；教书，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更是离不开“学问”。因而，我喜欢书名——《上课的学问》，朴实无华，一语中的。上课，教书育人，说到底，凭借的是“德性”与“学问”，而非所谓的教学“艺术”。离开“德性”“学问”这一根本，讲究这法那法，都是摆花架子、做表面文章。是先学后教还是先教后学，是串讲还是点拨，是讲授还是启发，是满堂灌还是满堂问……并不是太重要。真正高“德性”“学问”含量的课，自能无法而工、率性而妙，以致神而明之，出神入化。关键在教师德性、学问修养如何，有没有境界、胸襟。有境界、胸襟，自成高格，自是好课。

“德性”与“学问”是教师的基本素养，上课的底气。玉峰先生便是靠德性、学问的底蕴上好每一节课的。即所谓“气盛，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（韩愈《答李翊书》）——功到自然成，真正的好课，是从胸中流淌出来的。

为上好一课而备课，精雕细刻、千锤百炼，这样的课，也许规范、豪华，吸引眼球，但没有德性魅力、学问底气，便没有生命气息、思想魅力。今天，大量名师的观摩课就是如此。这样的名师，充其量就是照猫画虎的能工巧匠。而不为某一节课而备课，则注重修德性，养气质，做学问，明道理，积铢累寸，水到渠成。他不为上好一堂课而备课，是为上好所有的课而备课，用一生在备课。

他的课看似毫无章法，朴素平淡，却行云流水，气韵生动。他的课是有内在风骨气韵的课。或逐字串讲、条分缕析，或浮光掠影、蜻蜓点水，或浓墨重彩大写意，水击三千里，转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……无一定之规，有无法之法。为无为而无不为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

他的课最让人着迷的是兴之所至、忘乎所以的满堂灌。

我说他满堂灌，不是说他从头“灌”到尾，只是表明他“灌”得多而精彩，他的课适合于满堂灌，最佳形态是满堂灌。因为他“灌”的不是“水”，而是货真价实的“学问”，是几十年淬炼的思想精华，这比起许多教师莫名其妙的“对话”“讨论”“交流”等，更为有效、高效。即所谓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。满堂灌没什么不好，关键是“灌”什么。

与今天许多“高大上”的观摩课比，他的课不“美”，他既不是口若悬河、巧舌如簧的演说家，也不是风趣幽默、谈笑风生的表演家，他只是波澜不惊地娓娓叙说，说他想说的话，平淡如水而又直击人心的话。诚如老子所言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”（《老子·八十一章》）有德性，有学问，有境界，有内涵，其实怎么说并不重要。“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”（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），德之高下，学之深浅，在乎“意”，而非在乎“言”。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满堂灌，不靠多媒体取胜的课，只要有思想，有见地，也能博得满堂彩。

玉峰先生的满堂灌最出彩的是“知人论世”。这似乎是最老套的教法，

今天，再无能的语文教师上课也必说作者生平、时代背景，以为这就是“知人论世”。他们大多是照本宣科，从教参、网络中拿来，现买现卖。而玉峰先生不是，他说的是自己的研究心得，是自己的发现。听他的课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“知人论世”，什么是厚积薄发。

他教李白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《蜀道难》，给学生讲李白其人其事，是在读了李白所有的九百多首诗之后。教鲁迅的《拿来主义》，背后是对鲁迅几十年的研究。教其他的课何尝不是如此。他出版过专著《说李白》《说杜甫》《说苏东坡》《人是怎么不见的》……主编了十多本师生文艺读物。他讲授过二十多个专题：诗经专题、楚辞专题、唐诗宋词专题、鲁迅专题、胡适专题、皇帝专题、红楼梦专题、西方文化专题等。在上海电视台主讲过科举专题、李白专题、杜甫专题、苏东坡专题。可见其知识面宽广，“诗外功夫”博大。他是用德性、学问“知人论世”，用德性、学问换取教学的自由与率性。教师不做学问，不研究问题，怎能上好课？做学问不是随便读几本时尚读物，而是要做专题、系统、深入的研究：从微观、中观到宏观，由点、线到面。应了那句老话：“学海无涯苦作舟。”学问面前人人平等，没有天才，也没有捷径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要上好课，唯有老老实实做学问、明道理。

以德性、学问为基础，他的“知人论世”便与众不同，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、思考欲、言说欲、表现欲，激起他们做学问的动机。比如，他教《世间最美的坟墓》，叙说托尔斯泰的饱经忧患、简朴、大爱……让学生知道他的坟墓之美在于回归自然，象征着人格之美，朴素、高贵之美，是令人崇敬、震撼的美。他燃起了学生对一位崇高、慈悲、孤独的大文豪的无限敬仰之情，刷新并重塑了他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文学观、言语观。他教《边城》时对学生说：“你是不是应该去查一查沈从文那个时代？沈从文为什么会割腕自杀？他最后怎么样醒过来了，进行凤凰涅槃？他最后站起来了，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唯一的解放以后不写东

西的人，而所有写东西的人，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用处的东西。这点上面大家思考一下，为什么？”他使学生感受到向往自由的伟大心灵“沉默”的悲剧美。他让学生读文，更读人；解读，更解写；读有，更读无。他的“知人论世”，给予了学生言语内驱力与精神能量，蓬勃的言语生命生长性与可持续发展性。

在“尊德性”“道问学”上下足了工夫，他的课便无需以所谓的教学“艺术”取胜。学问做到了，有思想、有见解，便不必在“怎么教”上煞费苦心，怎么上都是好课。没学问，没思想，单凭能说会道、花言巧语，有趣、搞笑，会让学生一时开心，但不会留下什么，学生不会真正喜欢你的课，更不会使之一生热爱语文，忠诚于言语创造。德性、学问滋养出来的思想，是语文教师安身立命之本。劳于备课，必疲于教学，捉襟见肘；劳于学问，则逸于教学，左右逢源。真教案不是写在纸上，而是存乎一心；真教学不是按图索骥，而是随机应变、随心所欲。玉峰先生的课，朴拙、平实，难掩道义、睿智之光。

教师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，才有望达成与文本、作者的“平等对话”，以及与学生的良性“不平等对话”，才能达成真正的有效教学。

所谓“人生来平等”，是就人权、人格而言的。人的话语权，从来就不平等。撇开政治学、伦理学、社会学因素导致的“话语霸权”不论，在认知、学术领域，平等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，而是以德性、学问水平对等为前提的。因此，在教学中，不存在抽象的“平等对话”的可能。通常由于德性、学问水平的落差，师生难以与文本、作者平等对话。师生、生生间，存在水平的落差，也难以平等对话。在一般情况下，说“交流互动”则可，说“平等对话”则不可。但“平等对话”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，争取平等话语权的动机，可激励人们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。平等对话的权利不是谁赋予的，须靠自己努力去涵养、提升、修持。只有你的德性、学问修养与文本作者或他人大致持平，才能获得平等对话的

权利。如果反超，便取得了话语优越性。如果有了大境界、大学问，便至高无上、无与伦比，便获得话语权威。修养不足，便只有洗耳恭听的份。

由于师生间德性、学问水平是不平衡的，因此，教学中“平等对话”的机会并不多。但“不平等对话”未必就无效。如果教师对学生拥有德性、学问的绝对优势，话语权威便自然产生了，这就是满堂灌存在的合理性。教师的责任就是为学生释疑解惑的，必须处于话语权威地位，才能发挥引领、导向作用，这就是满堂灌存在的必要性。玉峰先生与学生之间存在修养上的绝对落差，因此，他的满堂灌不但合理、必要，而且有效、高效，这就是他的满堂灌备受欢迎的原因。这是一种良性“不平等对话”。一般而言，教师的德性、学问修养必须高于学生，所以，满堂灌——良性“不平等对话”应是教学常态。

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，当是教师心之所欲、魂之所系。德性与学问是师道之根本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维持师生间良性对话，才是有效、高效的教学，才有师道尊严可言。教师的话语权威，不是讲台赋予的，而是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。没有德性、学问的教师，便没有尊严可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，是对师道尊严之捍卫，是教师职业自豪感、幸福感产生之基础。失去这个基础，教师便没有生命的意义、存在的价值。没有德性、学问追求的教师，“潇洒”只是表面的，如果为师之良知尚存，其内心必不快乐，他一生都会很悲哀、很不幸。

基于良好的德性、学问修养，玉峰先生的“知人论世”得以高屋建瓴，得以“平视”，甚至“俯视”作者和文本，得以与其进行“平等对话”，或良性“不平等对话”，因而，他的言说便与众不同。他不屑于照本宣科，而是理直气壮、入木三分地品评、臧否作者和文本。

在课例中，他几乎对所有的作者，对托尔斯泰、鲁迅、冯友兰、杨绛、庄子、王羲之、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……都有基于德性与学问的追索与探究，他的“知人论世”的“知”与“论”，有自己的独特视角、真知

灼见。“知”是真知，“论”是新论。由于他的“知”与“论”高于、深于学生的认知，使他们能够受益颇多，因而，不论他是满堂灌或满堂问……不论怎么教，学生都能接受，而且心悦诚服。

这种率性挥洒的教学感觉是很美好的。浅陋的教师则有心无力，享受不到这种美好与愉悦。教师的幸福感，就是由教学中点滴的美好汇聚而成的。这种愉悦与幸福，又成为自我修炼、升华的动力。

教学是最没法糊弄人的，教师的修养、水平如何，学生心中是有一杆秤的。千万不可低估了学生的辨别力、判断力。讲台上的教师，不能辜负讲台下几十双明眸的渴望，不要忽视他们公正的检视。

教师的教学内容固然难免有相似之处，但是，有德性、学问的教师总是力求超越，追求卓越，希望与众不同、独领风骚。玉峰先生以不懈之努力，毕生之辛苦，逐渐与平庸的教师拉开了距离，并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。

玉峰先生教《世间最美的坟墓》，他崇敬托尔斯泰，赞赏其反对“暴力革命”，“不以暴力抗恶”，赞美其严苛的道德自律与仁爱之心，对人类之大爱，理解他曲高和寡的孤独感，逃避声名、财产羁累的崇高，称他为精神领袖——这也许有的教师也能做到。他进而赞美托尔斯泰哺育下的俄罗斯人民，联系中国“文革”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历史，斥责违背其精神的暴力与杀戮，指出暴力只会孕育暴力、暴政——这就只有极少教师能做到。他解读托翁坟墓“逼人的朴素”何以“禁锢”住人：“托尔斯泰不仅是俄国的伟大作家、伟大的思想家。托尔斯泰对我们中国的研究也是非常深的，他喜欢孔子，读过老子，读过庄子，读过孟子，他曾经翻译过《道德经》。他对老子的回归自然是十分欣赏。所以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了‘朴素’，老子提出了‘抱朴守素’……就是把非常自然的本色显示出来。他的这种回归自然、回归平凡、要求平等、要求自由，将观赏者深深地打动，所以他内心当中的道德律开始上升。康德曾

经说过：‘最令我感动的，一个是天上的星斗，一个是内心的道德律。’人本身有道德律，当你来到了托尔斯泰的墓前，内心的道德律就上升，使得你不敢做任何动作，不敢大声说话，不敢做任何有损于他的事情。”他不但与托尔斯泰息息相通，借助老子的“抱朴守素”与康德的“道德律”，为学生架起了理解文本的桥梁，使他们明白“朴素”何以能给予人心灵震慑，产生道德感，“禁锢”人的心情与行为，而且他以连篇累牍的深情讲述，把托翁的德性——“道德自律”的种子，播进学生的心田——这是绝大多数教师做不到的。

他的课以遮天蔽日、浩浩荡荡的“独白”见长，与作者、文本进行隐性的“对话”，学生心领神会，如获甘霖，充分表明了良性“不平等对话”的有效性。他的丰厚学识、自由思想与独特见解，使其在教学境界与能力上，与平庸教师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德性、学问水平与教学能力是对等的。

他的“知人论世”式的解读，鞭辟入里的品评、臧否人物，不但一般教师做不到，绝大多数名师也做不到。对作者发表点感想，评头论足并不难，难的是占据德性、学问高地，能“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思考、品评、臧否人物、事理、世相。

他说：“做人为文既要有自我，不能人云亦云，又不能过于自我。没有自我是不行的，过于自我更不行。”这可以视为他文本解读“知人论世”的原则。他解说海纳百川、汪洋恣肆的庄子，对庄子极尽赞美之能事，但也赞成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所言：“他虽说天道进化，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，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。”他称道冯友兰的学问，却对其人品不以为然，批评其政治投机，不是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而是“修辞立其伪”。他针砭鲁迅《拿来主义》的主观性、片面性，认为其论述以偏概全，违反矛盾律、同一律，同时也对文章的优点极力褒扬，表明“杂文”的文学性与说理性的矛盾……

追求话语的“精微”与“中庸”，当是其基本的教学思想、行为自律，也是其“知人论世”的精髓所在。

尽管他极看重“中庸”之道，然而，因他不人云亦云，他常被人视为“偏激”。殊不知，正是这种针针见血的“偏激”，体现了他的真性情、真思想、真德性，颇得“精微”“中庸”之宏旨，让人醍醐灌顶、豁然开朗。

玉峰先生的境界、胸襟，使他有资格“偏激”。他说：“虽然文章（指《拿来主义》）是这样小小的一篇，但是背后是我对鲁迅的整体研究，是几年来，乃至十几年、甚至是几十年来，我对鲁迅的研究。以前我对鲁迅是非常非常推崇的。我在1991年，贴了个广告——‘伟大而痛苦的灵魂’，我自己制的广告，全校的人都来听我谈鲁迅。很多人因为听了讲鲁迅，后来都成了鲁迅迷了。后来有了转折，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观点也会变。”做学问不但是求知，还会不断否定、修正、改变自我的认知，使你有了超越他人的眼光、视角，所以能发他人之所未见，言他人之所不能言。他的“偏激”，是德性、学问支撑起来的，是历经千锤百炼、深思熟虑的。觉得他“偏激”，即所谓“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”，也许该检讨的不是他，而是自己的境界、学问与眼光。真学问家的“偏激”总有其道理在，是高智慧的“误读”。与“无知者无畏”自说自话的偏激，有天壤之别。

玉峰先生的“知人论世”解读不是随便说的，在追求学理支撑上，体现了学问家的严谨风范。有人说“人云亦云不云，老生常谈不谈”，他觉得还不够，又加上一句：“道听途说不能说。”我以为，加上这句太给力了，才真正说到了要害。“人云亦云不云，老生常谈不谈”，只是强调要创新，有自己的见解，这当然是对的，很重要，但创新不只是方法问题，不能简单地“唱反调”，信口开河地胡侃，须“道听途说不能说”——说必有据。不是为赞美而赞美，为批判而批判，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。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，辛辛苦苦地读书、思考，一点一滴地积淀学识、思想，

才可望真正创新。

许多名师也读书、做“学问”，上课旁征博引，出口珠玑，仿佛学富五车、满腹经纶。但他们所谓的“学问”，其实连章学诚说的“功力”都达不到，只是在别人思想中寻章摘句，给自己装门面、贴标签，以眩人耳目。虽言辞奢华，但充其量只是“道听途说而说”的“土豪”水平。真学问须提要钩玄、殚精竭虑，须能融会贯通，承先启后，是“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”的整合的原创，是思想的生产。须“致广大”才能“尽精微”，“极高明”才能“道中庸”。——“道听途说而说”，即讲求科学态度，学必有根，言必有据。

如今“思想者”一词与“大师”一样，因过度使用而变得俗滥。大师满街走，还是大师吗？思想者亦如是。其实，多数自诩的“思想者”，大多只是“思想”消费者。只有极少数人称得上“思想”生产者。消费思想的人，跟消费物质的人一样，只是普通“消费者”。具有原创性思想的人，才称得上“思想者”。我以为，玉峰先生数十年如一日，不人云亦云、道听途说，孜孜以求于德性与学问的修炼，崇尚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实至名归，堪称“思想者”。

玉峰先生的课，是师生间思想的撞击与对接，是言语生命、精神生命的传承，是培育未来的“思想者”“立言者”的课。

作为“思想者”，他的课自然不乏独到的见解，但表达自己的见解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让学生懂得如何生产思想，懂得思想者是怎么炼出来的，这尤其难能可贵。

他教《蜀道难》，在梳理了他人各种观点之后，得出自己的独特结论：“这是什么，不是蜀道难，是仕途难。我认为这是他心灵的写照，虽然不管他当时自己意识不意识。他强烈的这种不如意，始终在这当中。这首诗是宣泄他内心的痛苦，不过他是一种艺术的宣泄，极度夸张的宣泄，把自己的痛苦放大了十倍、百倍、千倍、万倍，然后通过诗歌把这种痛

苦稀释为零，你看我们读他的诗感到痛苦吗？我们只是感到痛快，没有感到痛苦。其实他内心是痛苦的，但是他的诗写得痛快淋漓，明明写的是绝望，但是写得是那样的有气势，那样的雄壮。无论是色彩、形象、声音、感受都是那么的壮观，所以我说他是把绝望写成了一首雄壮的交响曲，把痛苦变成了一种享受、痛的快感，就像我们现代人所说的，痛并且快乐着，这就是李白。”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新解，他说：“我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别人的东西，就是自己的。”他接着为自己的新观点摆出一大套的理由与依据：“那这首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不是谁说的算，是我们对他的研究，对学术的研究，而得知李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我们要论文识人，知人论世，有比较才有鉴别。接下来我们就做这三件事情来论文识人……”他不是简单地将感受或结论告诉学生，而是告诉他们自己的观点是怎么来的，认知过程是怎样的，凭借的是哪些学术资源。这哪里是在上课？这分明是在做学术讲座，是手把手教学生求知、做学问的方法。

在师生互动中，有一位学生对他批评李白、欣赏苏东坡不以为然：“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觉得可能和老师您的观点不一样，我觉得做人应该像李白，而不是像苏东坡……”该同学说得蛮精彩，大家为其“有思想”而鼓掌。这时，如果是一般教师，大多会热情洋溢地说一番赞扬、勉励的话，可是，玉峰先生不只是这样，他也肯定这位学生说得有水平，但他对这种浮皮潦草的观点不认可。这位同学的发言，又引发了他对李白、苏东坡、王安石的长篇大论，他列举了许多事实，表明他称道苏东坡的理由，最后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多说一段话呢？你有思想很好，但是要做判断的话你读点苏东坡，读点书，把王安石读透，把苏东坡读透，把李白读透，你才可以说话，否则你是没有这个说话的权利的。”他要使学生明白观点不是来自一点感觉，不能胡言乱语，真正的“思想者”要“慎于言”，要把书“读透”，才有发言权。“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”，这才是“有